

# 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

## ——基于供需侧视角的机制研究

刘向东,何明钦,安婷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有望承担起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任。结合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阐释了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且主要源于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更突出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了流通业发展缓解城乡消费差距的两条渠道,其一是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倾向性作用,从需求层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张;其二是流通业发展能够通过优化商品供给条件释放农村消费潜能。异质性检验不仅进一步印证了流通业的积极作用,还显示了,政府围绕交通基础设施的财政支持,以及在欠发达地区的流通业扩张,更有助于激发流通业对城乡消费平等的积极效能。未来,我国应持续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充分依托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在关键领域加强政府“有为”之手,进一步助推共同富裕进程。

**关键词:**流通业发展;城乡消费差距;城乡收入差异;供给条件;财政支持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23)06-0018-16

**DOI:**10.14134/j.cnki.cn33-1336/f.2023.06.002

## Impact of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on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A Study Based on Supply-Demand Perspectives

LIU Xiangdong, HE Mingqin, AN Ting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Marx’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DCI) on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CI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mor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CI on th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channels: one is that the DCI plays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boosting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reby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rom the demand side; the other is that the DCI can strengthe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sire by improving commodity supply

**收稿日期:**2023-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研究”(18BJY176);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1XNH124)

**作者简介:**刘向东,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流通经济、新零售研究;何明钦(通讯作者),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流通经济、消费者行为研究;安婷,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流通经济与劳动力流动研究。

condition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role of DCI, but also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 support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 undeveloped areas, DCI will benefit more to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position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in key areas.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urban-rural income gap; supply conditions; financial support

##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课题,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sup>[1]</sup>。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学者基于横纵向比较,认为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在于收入差距较大<sup>[2-3]</sup>,并且从制度区隔角度<sup>[4]</sup>和资源差异角度<sup>[5]</sup>对其成因进行解释。伴随共同富裕这一时代新任务的开启,对“城乡发展差距”的理解也需更加深刻系统。

在共同富裕的思想下,一方面社会成员间不仅要消除收入分配差距,还要进一步谋求按劳分配实现的消费品平等占有<sup>[6]</sup>;另一方面,消费行为是一个复杂过程,收入仅仅是一个核心基础,事实上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只受收入约束,还与落后的消费环境尤其是商品供给状况有潜在关系。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是新时代谋求城乡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根本目标,也是相对于收入分配而言更有助于中短期政策工具直接作用的靶向。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能否凭借统筹城乡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突出作用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进程?具体来说,流通业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城乡消费差距?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环相扣,流通作为整体上的交换,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依托于流通职能的流通业在延续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媒介交换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分别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影响收入分配格局<sup>[7]</sup>,直接决定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流通体系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能支配市场中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和价格水平,间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因此,流通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其成为匹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着力点与突破口,有望对城乡消费差距产生潜在作用。

已有文献对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认识和破解,较少从流通视角切入,个别研究虽然探讨了商贸流通业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sup>[8-9]</sup>,但缺乏对于作用机制的系统性剖析和实证检验,也未能运用较为多元和精准的识别策略,或结合异质性分析以验证变量关系;此外,既有关于流通业经济效应的研究,大都是将流通业分析具象为对零售批发或物流仓储这种特定产业的一般性考察,使得流通视角过于泛化,正因如此,鲜有研究能从流通职能的机制层面证实流通产业的作用依据。

本文首先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四个环节出发,分析了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需求侧效应和供给侧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结合异质性检验,进一步厘清了二者之间的机制关系。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体现在:

第一,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提出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机制路径。本文从流通视角切入开启了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在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启发下提出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两种潜在机制——需求侧效应和供给侧效应,这不仅是对已有文献的理论填补,也有助于突破以“收入差距”作为消

费差距的单一诱因<sup>[10]</sup>来考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深理解流通业在共同富裕导向下的功能地位:流通业发展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城乡商品供给条件差距两个方面填补城乡消费鸿沟。

第二,深入剖析需求侧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商品流通过程”角度提出供给侧效应的验证思路,创新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在通过实证验证机制的过程中,本文深入分析得出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内因之一——流通业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相比城镇居民收入的更大幅度提升,从而表现为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倾向性促进。创新供给侧效应的验证思路,利用有限的数据,基于“商品流通过程”的角度证实流通业发展可以缩小城乡商品供给的商流条件差异和物流条件差异,为后续关于流通业发展供给侧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思路。同时选取运输线路长度和邮政网点数量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提高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第三,关注到地方政府的潜在作用。立足于中国情境,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在流通业发展缓解城乡消费差距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证实了财政支持围绕“关键领域”、流通业发展围绕“关键区域”的有效性,从而对地方政府在共同富裕目标上发挥作用提供更精准的调节依据和政策启示。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 (一) 流通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作为专业化从事商品媒介活动的经济系统,流通业在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演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仅因为流通业是流通职能的执行者和流通过程的承载者,关乎商品经济的活力,从宏观来看牵动着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一侧与消费一侧的匹配效率,最终会对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还体现为流通业及其微观业态组织的发展与演变,沿着供需链条引导上下游产业进行变革升级,推动产业链体系丰富完善和竞争力强化,再合力激发经济效能,提升人民生活福祉。围绕流通业发展经济效应的研究十分丰富,且视角广泛,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流通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产业联动与产业链竞争力、居民就业与福利的影响。

流通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产业联动的潜在影响,主要建立在流通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支撑作用之上,已有研究对于流通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大都给予了肯定,而针对流通业的视角切入以及作用机制的探讨却各有侧重,比如特定群体的福利改进(吴学品和李骏阳,2014)、城市层面的空间溢出(黄雨婷、文雯,2019),以及产业维度的价值链创新(唐红涛等,2021)<sup>[11-13]</sup>。

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就业和消费的研究也有相当成果。已有研究表明,流通业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会发展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在面临有效需求制约,无法有效带动就业增长时,流通业的就业吸纳效应就更为突出,在此过程中,也有望提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sup>[14]</sup>。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大型流通组织的进入可能会对区域内竞争力较弱的中小型流通组织产生挤出效应,显著限制其增长,如果竞争势头足够激烈,随着区域内流通组织经营集中度的提升,即便流通业规模和效率不断提升,也可能对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起到负面效果<sup>[15-16]</sup>。此外,流通作为“从总体上看交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可以通过分配环节影响消费条件,又能够支配商品交换的范围、数量和价格等要素决定消费可得性,所以,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扩张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普遍肯定<sup>[17]</sup>。

### (二)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

既有观点认为中国情境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于制度区隔和资源差异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政府出于特定的发展目标确定了一系列城市倾向型政策,包括户籍制度、社保体系制度、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以及对城市产业的转移项目,都直接导致了城乡分割尤其是收入不平等<sup>[18]</sup>,当然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助力工业部门扩张的直接举措。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积累不同,我国城镇地区的工业基础、商业服务以及社会性资源较之于农村地区具有显著优势,资源差异使得城镇居民更容易获得收入和其他福利上的有利地位,在财政的倾向性支持下,城乡间“鸿沟”可能越发加大<sup>[19]</sup>。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作为二元结构的

最直接反映,也引起不少学者探究相关影响因素。已有学者关注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与电商发展、数字金融和社会保障等普惠性经济和政策因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积极作用<sup>[20-24]</sup>,也有部分学者验证了农村偏向性政策红利的特殊效果<sup>[25-27]</sup>,都得出较为正面的结论和主张。

与此同时,聚焦于流通业发展和城乡差距关系的学术探讨却并不充分,相关文献或仍关注流通视角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如谢莉娟等(2021)从收入结构角度深入验证了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收入分配的剖析较为细致,但忽视了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对消费的重要影响<sup>[28]</sup>。或是关注电子商务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如刘长庚等(2017)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电商经济发展并不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分析认为,现阶段电商经济发展效益并未实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共享,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sup>[29]</sup>。虽然电子商务代表流通业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但从已有理论和现实实践来看,其聚焦信息问题,与社会再生产框架下聚焦流通职能和产业定位的意义相去甚远。谢乔昕和宋良荣(2016)研究表明,商贸流通业发展能够起到缓解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sup>[8]</sup>,遗憾的是文章缺乏对机制的深入考察。

综上,现有文献对于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少数文章虽然有所讨论,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或局限性:(1)虽以流通产业切入,但未立足于狭义或广义流通视角对内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这本质上是简单地将流通业分析具象为对零售批发或物流仓储这种特定产业的一般性考察。(2)对于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背后的机制缺乏实证意义上的考察,尤其是对收入效应以外的供给侧因素未予以足够重视,而这恰恰是流通作为商品经营部门的主要职能,也是触及城乡发展差距核心、促进消费福利平等化的潜在路径。(3)实证研究过程存在较为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对于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未作考虑,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已有文献结论的不一致。

### (三)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流通理论的基础,其将各种经济现象概括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既有所区别,也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了再生产过程的整体,而流通作为“从总体上看交换”,一边连接生产环节限制着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水平,一边通过收入分配环节影响社会消费能力。从需求侧来看,流通业具有延续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和媒介交换的价值实现过程的双重功能,既在前一过程中主导了生产性劳动(运输以及包装、分类、装配、补充加工)的初次分配,又在后一过程中影响商品所有者的初次分配。同时,供求态势的变化和社会流通过程的变动以价格为杠杆、动态地影响着流通渠道不同主体的再分配状况。从供给侧来看,社会分工决定了生产的专业性和消费的多样性必须依靠交换解决,作为以货币为前提的交换,流通是供给一侧和生产同等重要的构成要素,流通领域的问题极大影响着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也影响着消费需要的满足。据此,流通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可以划分为“需求侧效应”和“供给侧效应”。由于城乡发展差距主要源于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城乡消费差距根源上亦指向农村消费潜力长期受到抑制,因此,当流通过程引发的收入分配效果以及生产和流通一侧的供给改善更加惠及农村地区时,流通业发展就能显著地影响城乡消费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进程。

**1. 需求侧效应:流通业发展缓解城乡收入分配差异。**收入来源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分配环节,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所以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初次分配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地区整体偏低的收入水平自然约束了居民消费需求。流通业作为基础性产业,本身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sup>[14,30]</sup>;而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这就赋予了流通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倾向性影响,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潜在作用。

一方面,流通业发展通过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带动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收益提升,帮助农村居民增加农业经营性收入。目前,我国农产品供求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买方市场特征,终端零售市场反向决定上游批发市场和地头市场价格<sup>[31]</sup>;尽管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大量政策性补贴,但总体来看,农户的农产品定价权比较弱,这就导致农村居民较难通过农业生产弥补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而随着流通业的发展,农村居民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分配地位可能得到改善——流通业发展可以精准匹配农产品

供求信息、缩短上行过程中的交易链条、促进农产品流通到更广阔的市场,从信息流、物流和商流多个角度促进农产品上行,从而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

另一方面,流通业可以凭借其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突出的增长潜质,倾向性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提升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流通业整体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包容性较强,而我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质相对于城镇地区普遍较低,因此,流通业发展所创造的大量低技能岗位可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高度匹配。与此同时,由于流通业的从业门槛低、时间弹性大,能够根据其他行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及时释放和吸纳劳动力<sup>[32]</sup>,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流通业发展对农业部门的“竞争性”,更多发挥出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补充性作用。此外,“十四五”期间农村电子商务的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畅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势必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快递员、分拣员、仓库管理员等工作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增收可能性。

综上,从需求侧效应来看,流通业发展有望通过促进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提升农村地区的整体消费能力以释放需求,进一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本文由此提出假设:

H1:流通业发展能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

H1a: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促进效果相对于城镇居民更强。

H1b: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效果相对于城镇居民更强。

**2. 供给侧效应:流通业发展缓解供给条件差异。**交换上连生产,下接消费,交换活动可以指导、调节、改善消费,主要体现在流通业的规模和结构能够直接影响商品供给的时空边界与供需匹配成本。由于流通业在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破除城乡市场分割等方面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优势<sup>[33]</sup>,因而可能通过缩小城乡地区商品供给条件差异以缩小消费差距。

商品流通是“商流”和“物流”的统一体:商流涉及商品产权的交易和变换,属于信息匹配的范畴,而物流则是商品空间位移及交付的过程,属于空间匹配的范畴,相对应地,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供给侧效应亦有两种渠道:

其一,流通业发展有助于畅通城乡商品市场循环,通过优化农村商品服务供给质量带动农村消费相对城镇消费的倾向性扩张。一方面,流通业发展可以发挥以点带面的优势,强化流通组织横向联系以减弱市场分割态势<sup>[33]</sup>,激发连锁企业出于规模化扩张而下沉农村市场的动力,为农村地区带去优质商品,同时,现代流通组织的进入能提高农村市场竞争活力,倒逼在位企业进行管理能力升级,引入先进的营销技术和门店管理手段,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ICTs)对于商品交易和市场效率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sup>[34]</sup>,是商流畅通的必备要素。流通业在扩张过程中能够帮助改善农村商业网点供销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同时助力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和全渠道零售等创新模式的发展,以数字化市场的优势弥合城乡线下商品市场的差距,丰富农村的商品供给,提高居民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匹配效率,促使农村居民产生消费扩张<sup>[35-36]</sup>。

其二,流通业扩张辐射有助于带动农村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发展,通过缩小城乡流通成本差距以收敛城乡消费差距。我国农村地区交通条件落后、运输损耗大、市场集中度低、商品周转速度慢,高物流成本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总体高于城镇地区,从而加剧了城乡消费差距。流通业的发展有利于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反哺农村商业网点做大做强,提升农村流通组织化水平,在统筹城乡流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联动的过程中,收敛城乡市场价格不平等状况,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能,以此缓解城乡消费差距。本文也据此提出假设:

H2:流通业发展能通过缩小城乡商品供给条件差距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

H2a:城乡信息条件差距缩小有助于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H2b:城乡物流条件差距缩小有助于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 三、研究设计

#### (一) 基准模型与变量选取

为了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

$$Consgap_{it} = \alpha_1 + \beta_1 Circu_{it} + \gamma_1 Z_{it} + \the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Consgap_{it}$  表示  $i$  省(区、市)在  $t$  年的城乡消费差距,用以反映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核心解释变量  $Circu_{it}$  为  $i$  省(区、市)在  $t$  年的流通业发展水平; $Z_{it}$  是模型中所纳入的控制变量集,代表了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 $\theta_i$ 、 $\mu_t$  和  $\varepsilon_{i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相应地,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前的系数反映了各自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正如理论分析所述,流通业发展之所以能够潜在地缓解城乡消费差距,主要是通过对农村地区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效果而发挥作用的,为此,本文还分别引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Ucons_{it}$  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Rcons_{it}$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深入检验,回归模型如式(2)所示:

$$Ucons_{it}(Rcons_{it}) = \alpha_2 + \beta_2 Circu_{it} + \gamma_2 Z_{it} + \the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基准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及测度方式如下:

**1. 城乡消费差距(Consgap)**。现有研究多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衡量城乡消费差距,考虑到城乡人口因素对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潜在影响,这种方法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一方面采用泰尔指数反映城乡消费差距,另一方面沿用比值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泰尔指数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Theil_{it} = \sum_{j=1}^2 \left( \frac{Cons_{j,t}}{Cons_{i,t}} \right) \ln \left( \frac{Cons_{j,t}/Popu_{j,t}}{Cons_{i,t}/Popu_{i,t}} \right) \quad (3)$$

其中, $j=1,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 $Cons_{j,t}$  表示  $i$  省(区、市)在  $t$  年的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 $Cons_{i,t}$  表示  $i$  省(区、市)在  $t$  年全体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同理, $Popu_{j,t}$  表示  $i$  省(区、市)在  $t$  年的城镇居民人口数量或农村居民人口数量, $Popu_{i,t}$  表示  $i$  省(区、市)在  $t$  年的总人口数。

**2. 流通业发展(Circu)**。现有文献对流通业的类属界定并未统一,产生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在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中,根据研究目的使用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大流通”和“小流通”三个不同层面的“流通”内涵<sup>[37]</sup>,容易引发对流通的不同解读;另一方面则是流通联系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一侧和消费一侧,不可避免地在介入许多产业经济活动中。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认为,流通业的双重功能包括延续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和媒介交换的价值实现过程<sup>[7]</sup>,因此,依据两种劳动性质的界定,流通业应当划分为体现生产性劳动的物流运输仓储行业,以及体现媒介性劳动的批发零售业。沿用该划分方式,本文选取了统计年鉴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的对数反映地区流通业发展水平。

**3.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Z)**。除了流通业发展潜在地影响城乡消费差距以外,本文还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纳入了一系列地区层面对城乡消费差距产生影响的因素,具体如下:①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控制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Pgdp$ );②使用地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项(件)的对数,控制地区的整体创新水平或科技水平( $Innov$ );③使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控制地区居民收入水平( $Inc$ );④使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的对数,控制地区教育水平( $Edu$ );⑤使用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比年末全体常住人口,控制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Urban$ );⑥使用年末常住人口(百万)比地区国土面积,控制地区人口密度( $Dens$ );⑦使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地区产业结构( $Indus$ );⑧使用地区快递业务量(万件)的对数,控制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Deli$ )对居民消费的潜在影响;⑨使用地区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总里程与地区国土面积之比的对数( $Road$ ),控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构建了基于中国大陆31个地区(省级)层面2006—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在回归中所选取的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大部分变量信息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地区年度数据库;对于快递业务量(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项(件)以及后续纳入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电话接入用户数指标除了主要从国家统计局地区数据分省年度数据库获取外,还从CEIC经济数据库的中国经济数据库进行补充。回归中所使用的居民收入和消费等相关变量均以2006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进行了相应处理。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N=465)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城乡消费差距	<i>Consgap</i>	采用泰尔指数法衡量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	0.0975	0.0430
		采用比值法衡量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	2.3814	0.4429
城镇居民消费	<i>Ucons</i>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的对数	9.6782	0.4322
农村居民消费	<i>Rcons</i>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的对数	8.8270	0.5621
流通业发展水平	<i>Circu</i>	“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之和(亿元)的对数	7.3983	1.1509
整体发展水平	<i>Pgdp</i>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的对数	1.0646	0.5624
整体创新水平	<i>Innov</i>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项(件)的对数	10.0593	1.7531
居民收入水平	<i>Inc</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的对数	9.6500	0.5834
教育水平	<i>Edu</i>	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在校学生/在岗教师)的对数	2.8574	0.0689
城镇化程度	<i>Urban</i>	城镇常住人口与全体常住人口之比	0.5441	0.1454
人口密度	<i>Dens</i>	常住人口比地区国土面积(百人/平方公里)	4.4452	6.7250
产业结构	<i>Indus</i>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0.1293	0.0628
电商发展水平	<i>Deli</i>	快递业务量(万件)的对数	9.1902	2.1013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i>Road</i>	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总里程与地区国土面积之比的对数	2.4419	0.8360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围绕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进行了估计,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列(1)、列(2)分别是以泰尔指数法、比值法衡量城乡消费差距的结果。由第(1)列可知,流通业发展水平(*Circ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所反映的边际效应量也具有经济显著性,这表明,地区流通业的发展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由第(2)列可以看出,在以比值法测度城乡消费差距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流通业发展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证实了流通业发展对于缓解城乡消费差距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明确地区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内在机理,结合前文理论分析的假说,本文又对计量模型(2)进行了估计,表2中列(3)、列(4)分别是以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通过系数比较可以发现,流通业发展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却能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由此不难看出,流通业发展之所以能够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主要源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相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倾向性促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流通业的扩张和深化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存在明显效果。至于流通业发展通过哪些途径倾向性地促进农村居民实现消费扩张,本文在机制探讨中会加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发现:首先,居民收入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城乡消费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贫富分化却逐渐加深的现象互为印证,也凸显了现阶段共同富裕背景下政府展开“有为”调控的必要性。其次,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系数为负,这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外溢效应和普惠作用密不可分,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对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和要素流动能发挥更明显的效果,从而带动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而地区发展水平、创新水平、城镇化等因素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或不够稳健。

表2 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

	<i>Consgap</i>		<i>Ucons</i>	<i>Rcons</i>
	(1)	(2)	(3)	(4)
<i>Circu</i>	-0.0280*** (-3.0709)	-0.4082*** (-4.1544)	-0.0576 (-0.5415)	0.0779** (2.1635)
<i>Pgdp</i>	-0.0460** (-2.5554)	-0.2293 (-1.1844)	-0.0217 (-0.5478)	0.0987 (1.3909)
<i>Innov</i>	0.0026 (0.9182)	-0.0161 (-0.5364)	-0.0005 (-0.0787)	0.0058 (0.5268)
<i>Inc</i>	0.1519*** (4.9043)	1.2444*** (3.7342)	0.6843*** (10.0213)	0.0187 (0.1534)
<i>Edu</i>	-0.0028 (-0.1611)	-0.0258 (-0.1379)	0.0544 (1.4171)	0.0573 (0.8350)
<i>Urban</i>	0.0648 (1.5617)	-1.1079** (-2.4826)	0.0590 (0.6453)	0.6130*** (3.7478)
<i>Dens</i>	0.0069*** (4.0772)	0.0756*** (4.1397)	0.0064* (1.7092)	-0.0205*** (-3.0567)
<i>Indus</i>	-0.4718*** (-4.2972)	-6.4130*** (-5.4281)	-0.4532* (-1.8720)	1.4720*** (3.3991)
<i>Deli</i>	-0.0058** (-2.2167)	0.0792*** (2.8316)	0.0032 (0.5627)	-0.0095 (-0.9255)
<i>Road</i>	-0.0673*** (-5.3424)	-0.8449*** (-6.2354)	0.0357 (1.2844)	0.3503*** (7.0522)
<i>R</i> <sup>2</sup>	0.4250	0.8230	0.9941	0.9893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 *t* 值;上述所有回归过程均同时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而未在表格中列示。以下各表同。

## (二) 工具变量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回归。**为了化解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识别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净效应,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寻找互联网发展工具变量的思路<sup>[38]</sup>,从行业发展基础的角度探索外生工具。自古以来,无论是驿站、商道的形成,还是由于人类聚居延伸出的各种天然道路,都能显著促进区域内的商品交换。《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描述汴梁城(今开封市)“东京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其中交通水平对于商业繁荣的意义不言而喻,张民服(2004)通过对明代史料研究发现,中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线的发达与畅通<sup>[39]</sup>。历史上的关中地区和闽粤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对外贸易最频繁的区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早在西汉时期就贯通和延伸的“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道路的修缮和建设都具有时代传承性和历史关联性。历史道路的存续时间久——动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过不定期的修缮即可作为人口流动和货物运输的动脉,持续为后代产生积极效益。新道路的建设路线具有历史关联性,道路的属性决定了新建道路须建立与原有道路网络的连接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因此,历史上交通线路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极有可能流通业发展水平更高。

道路作为商品流通的“硬设施”影响流通业发展水平,而到了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基础设施不完善、民间物流业不发达,邮政网点在很长时间内扮演着商贸信息传递和货物存储的近现代“驿站”角色。2006年,我国邮政行业开始实施政企分离,邮政局所体系下的营业网点,仍然享有邮政公司独有的邮政普遍服务(信件、报刊发行、包裹、按址汇款等业务)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快递服务,并且在大多数地区,邮政营业网点和快递营业网点形成区分,前者更多承担起具有社会公共品属性的邮政普遍服务,因此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中的邮政网点数量与快递网点数量(邮政公司统计包括 EMS 网点、邮政网点、快递柜、合作网点等)并不相同,邮政网点更多地与信息传递相关,也影响商贸流通的商流和资金流条件。特别是在偏远地区,邮政网点至今都是重要的信息、货物往来窗口,因此,地区邮政网点的数量,一定程度上也能影响流通业发展水平。

鉴于此,选取运输线路长度和邮政网点数量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可满足相关性要求。至于外生性要求,邮政营业网点的职能和作用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从目前来看对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十分微弱;另一方面,邮政营业网点的开办受政府主导,更多与行政服务和地理区位的民生和战略需求相关,市场化属性较弱,不是构成流通业发展的直接组成,因此外生性比较明显。而运输线路长度则不一定严格外生,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高铁建设和高速公路建设对于推动地区发展、缓解城乡差距的作用有目共睹。所以,要保证运输线路长度作为工具的外生性,一个策略是采用各个地区明清时期就存在的水陆各类“驿道”里程——历史上的驿道条件如今很难对城乡消费差距产生影响,<sup>①</sup>由于各个地区的驿道里程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就选取了二级公路、等级外公路和内河航道的里程并取对数以反映历史上的地区道路状况。这是因为二级公路、等级外公路和内河航道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早,许多线路都是在古驿道的基础上修建或畅通,不容易受城乡一体化进程等因素影响,符合外生性条件;特别是等级外公路和内河航道的历史地位如今已被取代,因通行条件大都较差,货运和客运量十分有限,难以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产生明显作用。

综合上述考虑,本文使用地区每万人二级公路、等级外公路、内河航道总里程的对数(*IV1*)和每万人邮政网点数量(*IV2*)作为地区流通业增加值的工具变量,并利用矩估计工具变量法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由表3(1)列可知,采用工具变量回归后,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且回归系数与表2(1)列相近;结合弱识别检验统计量为64.248,远大于10%临界值(19.930),证明了工具变量与流通业发展的强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检验所选取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得出两个变量估计系数分别为0.0014( $t=0.5102$ )和0.0016( $t=0.3286$ ),即不具有显著性,说明两个工具变量只能通过流通业发展而不能直接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综合而言,在考虑并剔除了内生性问题以后,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效果是成立的。

表3 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i>Consgap</i>				
	(1)	(2)	(3)	(4)	(5)
<i>Circu_IV</i>	-0.0204*** (-3.0039)				
<i>Circu_A</i>		-0.0134*** (-3.1479)			
<i>Circu_B</i>			-0.0056* (-1.8912)		
<i>Circu_C</i>				-0.0099** (-2.3205)	
<i>Circu_lag</i>					-0.0169* (-1.86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6974	0.8231	0.3978	0.4133	0.4241
观测值	430	465	397	465	434

注:(1)列括号内报告的是 $z$ 值,其余括号内为 $t$ 值;(1)列工具变量回归的 $R^2$ 为Centered数值;上述回归均纳入了控制变量,限于篇幅而未在表格中列示,以下各表同;工具变量回归中,不可识别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86.098( $p < 0.01$ ),拒绝不可识别假设,弱识别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64.248,拒绝弱识别假设,Hansen J 统计量为2.585( $p = 0.1079$ ),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

**2. 稳健性检验。**针对第二种问题,本文替换“流通业发展”衡量方式重新估计回归方程,从而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先后选择地区限额以上批零企业资产总额、<sup>②</sup>地区亿元以上商品市场销售额替换流通业增

<sup>①</sup>之所以限制在明清时期,是要保证“驿道里程”作为工具的相关性条件;如若追溯到明清时期以前,可能由于地理条件和人口格局与目前存在过大差异,便很可能弱化了工具的相关性。

<sup>②</sup>由于国家统计局地区年度数据未披露物流、仓储、运输行业的限额以上企业状况,所以此处暂以批零产业情况反映流通业发展状况。

加值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并作不变价和对数处理。同时,为了规避宏观维度解释微观指标可能存在的传导性偏误,本文另以人均流通业增加值替代流通业发展水平纳入回归。此外考虑到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果,本文还生成了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如表3的列(2)、列(3)、列(4)、列(5)所示,从中能看出,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 (三) 机制探讨与检验:需求侧效应与供给侧效应

1. 需求侧效应检验: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针对需求侧效应的检验,本文基于 Baron 和 Kenny (1986)对中介机制的讨论<sup>[40]</sup>,在基准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方程:

$$Incgap_{it} = \alpha_3 + \beta_3 Circu_{it} + \gamma_3 Z_{it} + \eta_i + \delta_t + \nu_{it} \quad (4)$$

$$Consgap_{it} = \alpha_4 + \beta_4 Circu_{it} + \beta_5 Incgap_{it} + \gamma_4 Z_{it} + \eta'_i + \delta'_t + \nu'_{it} \quad (5)$$

其中,  $Incgap_{it}$  为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需求侧效应检验的中介变量,也使用泰尔指数计算得出,其余模型设置与基准模型(1)相同。在基准模型  $\beta_1$  显著为负的情况下,如果系数  $\beta_3$  和  $\beta_5$  都显著,说明存在间接效应,此时,当  $\beta_4$  不显著时,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  $\beta_4$  亦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

表4列(1)一(3)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由第(1)列可知,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大力发展流通业能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说明,无论是否在回归中纳入流通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都对城乡消费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加剧城乡消费二元性;同时,当纳入中介变量后,流通业发展这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证明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解释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内在机制在流通业发展和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传导过程,本文分别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 $Uinc$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 $Rinc$ )对流通业发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的列(4)、列(5)所示。从中能够发现,流通业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系数大小来看,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效果明显更强,由此也能证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作用。综合表2和表4的结果可以判断:流通业通过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需求层面的预算约束,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刺激农村居民更积极的消费行为,对城乡消费差距起到收敛效果。

为了使传导机制更加清晰,本文分别计算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对收入的回归份额),结果如表4列(6)、列(7)所示,能够看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城镇居民,结合之前基准回归表2的结果,可进一步证实,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倾向性地促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后在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下表现出比城镇居民更积极的消费行为,由此,需求侧效应的机制合理性得以验证。

表4 需求侧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i>Incgap</i>	<i>Consgap</i>		<i>Uinc</i>	<i>Rinc</i>	<i>Ucons</i>	<i>Rcons</i>
	(1)	(2)	(3)	(4)	(5)	(6)	(7)
<i>Circu</i>	-0.0171 *** (-2.9722)		-0.0141 * (-1.7779)	0.0304 ** (2.2961)	0.1050 *** (7.1319)		
<i>Incgap</i>		0.8326 *** (12.4738)	0.8152 *** (12.1158)				
<i>Uinc</i>						0.4329 *** (4.5920)	
<i>Rinc</i>							0.7015 *** (11.086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5574	0.5736	0.5769	0.9977	0.9979	0.9896	0.9932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注:本表中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z$  值为 -5.4619,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在列(4)一列(7)的回归中,被解释变量均为收入水平,因此剔除了控制变量中的人均收入水平。

**2. 供给侧效应检验:商品流通过程的角度。**针对供给侧效应的探讨,若能找到直接反映城镇和农村商品供给差异的信息作为中介变量,便能采用中介效应思路进行检验,比如各地区历年城市、农村的商品流通品类差异。但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上述流程难以操作。由于无法从商品供给水平进行检验,那么本文就尝试从影响商品供给的“条件”出发,基于“商品流通过程”的角度解析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供给侧效应,检验流通业发展是否能缩小城乡商品供给的商流条件差异和物流条件差异。

从“商流”过程来看,历史上批零购销关系的形成,都依赖于及时、准确的信息传递,因此,检验商流相关供给侧效应的一个思路是比较在不同的城乡信息条件差距情况下,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差异化效果。本文先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城乡宽带接入率差异(*Netgap*)作为调节变量,用以反映城乡商品供给的“信息条件差距”,计算方式是基于城镇宽带接入用户数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构建泰尔指数(2011—2020年),而后与流通业发展构成交互项( $Net \times Cir$ ):如果城乡宽带接入率差异扩大,会使得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效果变弱乃至经济意义不显著,那就能从侧面说明,地区商品供给信息条件差距是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一个机制。表5第(1)列呈现了估计结果,从中看出,交互项( $Net \times Cir$ )的系数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数据观察期内,我国大多数区域性实体流通企业的供销信息仍通过电话沟通,尤其是农村商业网点现代化程度较低,商流信息的处理复杂度较低,无须依赖于互联网手段,使用宽带接入率差异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城乡商流信息条件的真实差异。为了排除上述因素干扰,本文计算城乡电话接入率差异(*Telgap*),即基于城镇地区电话接入用户数和农村地区电话接入用户数构建泰尔指数(2006—2017年),以此替代上述模型中的城乡宽带接入率差异重新估计。表5(2)列报告了结果,结合流通业发展和交互项系数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判断,城乡电话接入率差异会显著地抑制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效果,如若城乡信息条件差距持续扩大,流通业发展的边际增加反而可能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这说明,城乡“信息鸿沟”缩小是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一个供给侧机制。

从“物流”过程来看,供给侧效应表现为流通业发展通过带动农村地区的物流和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商品流通成本差异,进而刺激农村居民在更实惠的价格水平下扩大消费。从图1可以发现,2006年以来,农村地区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地区,这是我国城乡“消费鸿沟”的直观体现。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一价定律: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相同商品在不同地区出售的价格应该是相等的。而我国城乡之间不存在制度相关的贸易限制,同时,虽然农村批零网点数量有限,但主要受需求规模所制约,集中度并不高,单个网点难以通过垄断行为影响商品价格,因此,我国城乡商品价格差异主要源于物流成本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如果流通业发展有效收敛了城乡之间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差异,那么就能说明流通业发展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物流相关的供给侧效应得到支持。同时,物流成本主要又与流通基础设施相关,这其中道路货运状况尤为关键,因为直接的流通基础设施数据难以获取,可以选用地区城乡邮政投递线路差异作为影响城乡物流成本和商品价格差距的核心变量,我国公办邮递业务能满足全国每个“神经末梢”的信息与货物投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道路基础设施状况,基于此进一步验证基础设施差异的机制作用,可与直接验证商品价格差异形成交叉补充。

具体地,本文首先通过计算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差值的绝对值,尝试检验流通业发展对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差异(*difpri*)的影响;此外,从宏观经济变动规律来看,“价格”在短期内是具有黏性的,伴随着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年度调整与目标锚定,厂商和消费者这类微观主体通常会保持1—2年进行一次的价格(预期)管理,<sup>①</sup>所以流通业发展对当年的价格变动可能并不会产生即时影响,鉴于此,本文分别对解释变量滞后1、2期再进行估计。

其次,由于许多山区居民居住分散,农村地区邮递线路甚至超过城镇地区,所以需要指标进行适当

<sup>①</sup>从宏观层面中央政府的GDP目标设定周期、央行的货币政策周期以及餐馆的“菜单成本”效应均能看出,价格信号通常在1年以内都会保持相对“黏性”。从各地区财政部门公布的商业服务业支出明细中无法判断具体流向,本文通过调研财政学者、并结合北京市、青岛市等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公告,总体推测我国地方政府商业服务业财政支出的主要流向包括但不限于:支持城市商圈建设、居民消费补贴、商业服务业企业补贴、行政与市场监管费用。

处理,本文使用(城镇邮政投递线路—农村邮政投递线路)/农村邮政投递线路作为调节变量(*difmroad*),与流通业发展的滞后1、2期形成交互项(*Difm × Cir\_l1*、*Difm × Cir\_l2*),并以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差异(*difpri*)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回归方式验证基础设施条件的作用。

表5列(3)—列(6)给出了估计结果,能够看出,流通业发展对后续两年的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差异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确实能产生比较持久的效果;对隔年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差异的收敛作用显著大于对次年的作用。综合来看,地区流通业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城镇和农村商品价格水平的不平衡状况,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后两列的结果反映出城乡邮政投递线路差异会抑制流通业发展对城乡商品价格差异的收敛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城乡道路基础设施的作用,也相对稳健地印证了流通成本差异主导的物流过程的供给侧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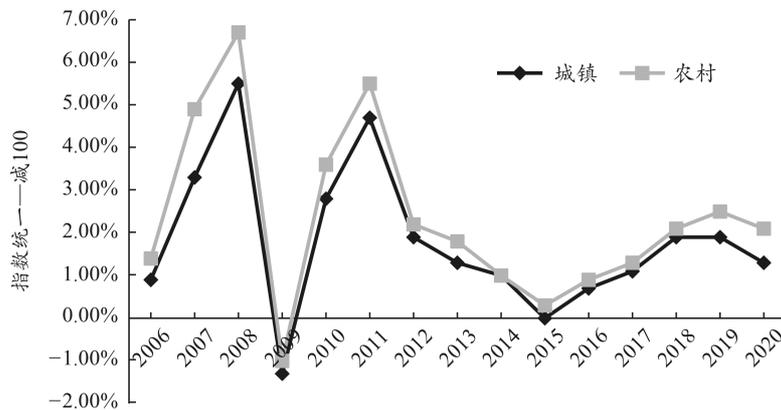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趋势(全国)

表5 供给侧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i>Consgap</i>		<i>difpri</i>		<i>difmroad</i>	
	(1)	(2)	(3)	(4)	(5)	(6)
<i>Circu</i>	-0.0227 ** (-2.2280)	-0.0314 *** (-3.0191)				
<i>Netgap</i>	-0.0194 (-0.3888)					
<i>Net * Cir</i>	0.0024 (0.3249)					
<i>Telgap</i>		-0.2718 *** (-8.3177)				
<i>Tel × Cir</i>		0.0443 *** (8.1972)				
<i>Circu_lag1</i>			-0.8178 ** (-1.9230)		-0.03596 * (-1.7826)	
<i>Circu_lag2</i>				-1.2308 *** (-2.6432)		-0.2869 (-0.7380)
<i>Difm × Cir_l1</i>					0.3801 ** (-2.1726)	
<i>Difm × Cir_l2</i>						0.3600 ** (-2.0708)
<i>Difmroad</i>					-3.0985 *** (-2.9165)	-2.9757 *** (-2.82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R</i> <sup>2</sup>	0.3619	0.5390	0.3359	0.2968	0.2678	0.2695
观测值	297	369	378	351	270	270

注:因数据披露年份所限,(6)、(7)列回归数据基于样本期间为2011—2020年。

## 五、异质性分析

### (一) 地区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步调并不一致,因此,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化效果;与此同时,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历史商贸发达程度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流通业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进一步对样本按地区细分,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异质性验证作用效果。

针对经济发展状况异质性,本文沿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依据,对全样本进行分类:东部地区大都为沿海省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率先实现经济飞跃,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中部次之,西部则身居内陆和边疆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活水平较之于中、东部地区略低。表6报告了模型(1)按经济发展状况的分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在不同发展状况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影响效果亦不一致,在中部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在东部地区虽然流通业发展仍能显著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但其作用效果( $\beta_1$ )仅为在西部地区的1/3左右,这种统计学和经济学双重意义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彰显了流通业对经济落后地区共同富裕的更突出作用,即可能根源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之间的横向差异。另一方面,流通业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效应,也可能会随区域发展水平的递增,呈现出潜在的U型趋势,正如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的关系在“中间地带”并不显著,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低,且产业结构与收入水平差异不大,这更多是因为流通业发展引发商品供给更丰富,缓解西部地区的消费需求多元化困境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东部地区,虽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部地区的居民,但更高的收入和发达的服务业,让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有更多机会在流通业发展过程中实现劳动力流动和收入改善,这主导了实际的消费扩张,从而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针对流通业发展水平异质性,本文根据各年份全国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之和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高发展程度”和“低发展程度”两组。同样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后两列所示,可以发现,尽管对于流通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较高的地区而言,流通业缓解城乡消费差距的效果都具有显著性,但在流通业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作用发挥更有成效,表现为边际效应量和统计显著性更大,由此更加印证了流通业发展对于城乡消费福利平权的积极作用。

表6 经济发展状况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

	Consgap			Consgap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高发展程度	低发展程度
<i>Circu</i>	-0.0253* (-2.4758)	0.0063 (0.2748)	-0.0879*** (-4.0751)	-0.0394*** (-3.9886)	-0.0306* (1.92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763	0.6598	0.4836	0.7559	0.3931
观测值	234	231	247	236	229

注:上述分组回归的组间流通业发展(*Circu*)系数差异,通过去除个体效应后的似不相关回归(SUR)检验,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 $\chi^2(2)=9.52$ , $\chi^2(1)=3.98$ ,说明不同组之间的流通业发展系数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后表同理,也均在10%内通过了系数差异检验。

### (二) 财政支持的作用

在自由市场理论框架下,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公平和平等的分配状态,企业作为市场运行主体,无法承担深度调节收入分配以及解决外部性的职能,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要建立在市场效率和政府对公平保障的双重基础之上。历史上,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统筹城乡流通业发展方面进行了诸

多尝试。2005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引导城市连锁流通企业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sup>①</sup>但该项目经过多年的实验最终偃旗息鼓,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流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依赖补贴手段干预企业行为很难起到长效作用。2008年,农超对接试点工作正式部署,<sup>②</sup>旨在将现代流通体系引入广阔的农村市场,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虽然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由于农户经营过于分散、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等原因,仍然限制了“农超对接”的延伸空间。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有效的政府干预一般是围绕改善优化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发力,在这些企业无法解决的难题上,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sup>[41]</sup>。

从财政支持的角度看,由于政府财政支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具备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有为政府”对于流通业职能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依赖财政投入作为支撑与引导。普遍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意味着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支持力度也越深,因此,本文选取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反映财政支持力度(*Fisc*),并且根据各地区年度财政支持力度是否高于中位数为依据,将各年样本划分为“高财政支持力度”和“低财政支持力度”两组,进行分组异质性回归;另外,考虑到财政支出门类较多,且具有城市倾向,笼统地考察总体支出便无法识别地方政府财政有为的效果和正确靶向,本文因而选取了与流通业发展相关的财政“交通运输支出”作为分组依据,进行分组回归,上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确实是流通业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产生异质性关系的原因,结合前两列来看,财政支持力度更高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会更显著,对比表2第(1)列的系数大小能够得到初步印证,同时,在财政支持力度较低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侧面反映出流通业扩张过程中,其普惠性和助农扶农效应可能需要财政投入的补充和配合。表7后两列的结果也能说明,在交通运输领域受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更高的地区,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效果更明显,结合现实情况不难理解,地方财政交通运输支出一般用于道路新建、养护以及运输补贴等方面,而基础设施往往具有公共品属性,虽然投资的直接收益低,但能创造广泛的社会、环境福利效益,因此,当地方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大时,一定程度上能带动缓解城乡流通基础设施不平衡状况,缩小城乡物流成本所引发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潜在地收敛城乡消费差距,再次证明了政府在流通业发展和作用发挥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意义。

表7 财政支持力度异质性检验

	<i>Consgap</i>			
	高财政支持力度	低财政支持力度	高交通运输投入	低交通运输投入
<i>Circu</i>	-0.0303 ** (-2.1180)	-0.0196 (-1.3512)	-0.0593 *** (-4.0912)	-0.0303 *** (-2.892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R^2$	0.4763	0.6598	0.4836	0.6195
观测值	234	231	247	218

##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推进共同富裕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尤其是助力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不确定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立足于国内大市场,加快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不仅对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前中国保持经济活力、催化新旧动能转化进程的强力支撑。

<sup>①</sup>“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指2005年开始实施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工程。国家通过安排财政资金,以补助或贴息的方式,引导城市连锁店和超市等流通企业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

<sup>②</sup>“农超对接”项目是2008年启动试点,由国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大型连锁超市和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进行对接,一方面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另一方面助力农产品销售。

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商品流通职能,考察了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内涵,从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两个维度为推进城乡居民福利优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可印证的剖面,系统性地厘清了流通业发展、城乡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地区流通业的扩张性发展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深入考察发现,流通业发展的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地区消费扩张而实现,这说明,流通业尽管整体上遵循“先城后乡”的发展规律,但并不妨碍其对农村地区更为显著的带动效果。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效果,又表现为需求侧效应和供给侧效应两种途径。具体而言,一方面,流通业扩张和发展能够畅通城乡商品市场,带动农村地区补齐物流和商流短板,协调缩小城乡商品供给条件差异,进而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刺激农村地区消费扩张;另一方面,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通过流通的再分配功能,倾向性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即通过缓解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以缩小城乡消费鸿沟。第三,地方政府面向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支持和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保障,在流通业发展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进程中都能起到“有为”保障性作用。除此之外,政府围绕商业服务业领域的直接财政支持没有表现出积极作用,甚至在当前,地区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反而还会抑制流通业发展收敛城乡消费差距的效果。在以收入和消费福利为主要目标的共同富裕语境下,上述研究发现表明了流通业发展对于优化农村供需侧条件、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作用。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未来的相关政策核心,要强化流通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突出地位,发挥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

首先,要强化流通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突出地位,发挥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为此,必须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尤其是重点补齐农村流通体系的短板,鼓励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迭代,助力农村实体批发零售业转型升级,减少因低效供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侵蚀。

其次,通过畅通农产品上行的链路,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吸纳增加农村居民的务农收入和非农收入。政府要引导探索农产品上行的创新模式,做好畅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渠道建设,通过提升农村流通网络的产供销媒介效率助力乡村振兴,加强供销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力量,帮助广大农民相对平等地参与市场活动,提升渠道地位和相对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的务农收入。不仅如此,还要根据市场条件,支持农村地区建设现代流通组织建设,促进农村流通体系整体竞争力,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快递物流配送下沉进村,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门槛低、灵活性强的就业岗位,拓展非农收入来源。

最后,在支持和发挥流通组织市场主体力量的同时,还要重视流通业的发展环境建设,特别是强化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欠发达地区流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补位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引导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与信息通信条件,破除制约流通体系扩张的资源和环境阻碍,降低基础性流通成本,促使流通组织和流通渠道下沉农村。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下,要侧重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通过运用政策手段盘活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资源,优化流通供给、畅通流通渠道,以释放其庞大的消费潜能,多位一体助推城乡共同富裕。

####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 全面打造城乡协调发展的引领区[N]. 人民日报, 2021, 8-5.
- [2] YANG D T.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306-310.
- [3] 李实, 朱梦冰. 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 管理世界, 2018(12): 19-28.
- [4] 刘晓光, 张勋, 方文全.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 世界经济, 2015(3): 145-170.
- [5] 陆铭,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6): 50-58.
- [6] 赵学清.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探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4): 52-56.
- [7] 王晓东, 谢莉娟. 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6): 72-93, 206.
- [8] 谢乔昕, 宋良荣. 商贸流通业发展影响城乡居民消费二元性的实证分析[J]. 消费经济, 2016(2): 12-16.
- [9] 刘导波, 张思麒.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4): 62-69.
- [10] BLUNDELL R, LUIGI P, IAN P.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partial insur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5):

1887-1921.

- [11] 吴学品,李骏阳. 流通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导途径及其效应的检验[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04-111.
- [12] 黄雨婷,文雯. 流通业发展、空间互动与城市经济增长[J]. 产业经济研究,2019(4):75-87.
- [13] 唐红涛,陈欣如,张俊英.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11):5-20.
- [14] 王晓东,谢莉娟. 论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基于中部地区流通业对就业吸纳的贡献分析[J]. 财贸经济,2010(2):98-103.
- [15] BASKER E. Job creation or destruction?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wal-mart expans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5,87(1):174-183.
- [16] HALTIWANGER J, JARMIN R, KRIZAN C J. Mom-and-pop meet big-box: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67(1):116-134.
- [17] 丁宁. 流通创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13.
- [18] 邓金钱.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143-150.
- [19] LIN J Y, CHEN B.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from th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strategy[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11,6:1-21.
- [20] 刘晓光,张勋,方文全.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 世界经济,2015(3):145-170.
- [21] 程名望,张家平. 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 中国农村经济,2019(2):19-41.
- [22] 姚战琪.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34-47.
- [23] 李洁,邢炜. 电商市场发展与中国城乡消费趋同性——搜寻匹配的分析视角[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2):103-112.
- [24] 吕承超.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规模与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7(5):98-110.
- [25] 肖育才,姜晓萍. 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7(11):35-45.
- [26] 王健,赵凯. 中国城镇化、老龄化、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 当代经济管理,2020(7):49-58.
- [27] 王欣亮,刘飞. 基础教育投入不均会扩大城乡消费不平衡吗? ——基于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19-127.
- [28] 谢莉娟,万长松,武子歆.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公有制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1(6):111-127.
- [29] 刘长庚,张磊,韩雷. 中国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11):5-18.
- [30] 程进文,刘向东. 结构负利:流通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6):32-44.
- [31] 陈秀兰,张熙钰,杨建颖. 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微观探析——兼析农产品流通模式对价格的影响[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9):33-36,106.
- [32] YUAN D, ZHANG H, BAO H, et al. The self-employment of the industry choices of dispossessed farm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55:143-156.
- [33] 王晓东,张昊. 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非政府因素探析——流通的渠道、组织与统一市场构建[J]. 财贸经济,2012(11):85-92.
- [34] AKER J C. Information from markets near and far: mobile phon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niger[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2(3):46-59.
- [35] 刘向东,何明钦,刘雨诗. 数字化零售能否提升匹配效率? ——基于交易需求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OL]. 南开管理评论:1-29[2022-02-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20228.1314.002.html>.
- [36] 赵霞,徐永锋. 网络零售能撬动城乡居民消费吗? [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10):20-33.
- [37] 谢莉娟,王晓东. 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J]. 经济研究,2021(5):20-39.
- [38]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 [39] 张民服. 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J]. 史学月刊,2004(11):32-38.
- [40]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6):1173-1182.
- [41] 林毅夫,玛雅.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J]. 开放时代,2013(5):194-211.

